

论加纳农民反抗斗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

李安山

1948年1月,阿克拉酋长尼伊·克瓦贝纳·波尼三世领导了一场抵制进口货的运动。经过谈判,抵制运动确定于2月28日结束。当天,一群退伍士兵举行和平示威游行,要求改善生活待遇。游行队伍在向总督府行进时,与武装军警发生冲突。2名示威者被打死,4~5人受伤。民众被殖民政府的暴行所激怒,开始捣毁欧洲人和叙利亚人的商店,政府也采取镇压措施。结果29人死亡,237人受伤。这就是有名的“阿克拉事件”。事后,英国政府委派沃森委员会到黄金海岸调查事件原由。委员会的报告提出17个因素(政治、经济和社会)与此事件有关。报告指出,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政府砍掉可可肿芽病病树的措施以及实施这一政策时的不适当方法。本文将讨论殖民政府对肿芽病的防治措施,探讨为什么这一有效控制肿芽病的办法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抗,并将进一步分析农民反抗斗争与现代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

—

1936年,黄金海岸的可可出口量达到高峰。同年,东部省的科福里杜亚发现了可可肿芽病(Swollen shoot)。这种病称为“肿芽病”,是因为可可树芽肿大是唯一的症状,几年后病树即逐渐死去。肿芽病开始仅局限在一小块地带,但很快传播到其他可可生产区,如阿基姆-阿布阿夸地区和曼尼亚-克罗波地区。然后,肿芽病又向西部和西北部蔓延。1941年殖民政府试图在夸胡地区与阿散蒂之间设立一条防护带,以防止肿芽病的传播。到1943年,肿芽病首次在阿散蒂发现。同时,肿芽病也出现在中部省和西部省。二战以后,肿芽病很快传播到几乎所有的可可生产区,危害日益严重。在1939年以前,每年因肿芽病死亡的可可树约100万棵;从1939年到1945年,则猛增达500万棵。1936~1937年,可可的产量为30万吨,到1946~1947年,只有19.2万吨。按当时的价格计算,仅这一年就损失了648万英镑。所有这些数字显示,肿芽病是“可可业的头号敌人”。

早在1936年,殖民政府即提议砍掉病树及周围健康的可可树,以免感染。这一政策虽然没

Nii Kwabena Bonne III, *Mileston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Gold Coast: Autobiography of Nii Kwabena Bonne III* O. su Alata Mantse (Diplomatic, 1953), pp. 63-88

(英国殖民部文件) Colonial No. 231.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to the Disturbances in the Gold Coast, 1948*. 此后将简称为 Watson Report (《沃森报告》)。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936-1937, p. 2

(加纳政府行政档案) ADM 11/1799. Provincial Council (Eastern Province). Minutes of the 35th Session of the Provincial Council of Eastern Province, 23 September 1941, pp. 29, 41.

"Data on swollen shoot", *The Gold Coast Observer*, 6 February, 1948, pp. 486-487.

Information Service Department, *Golden Harvest: The story of the Gold Coast cocoa* (Accra, 1953), p. 28

有遇到公开的反抗,但明显地不受欢迎。殖民总督认识到,这种不欢迎态度将成为不满的根源。1941年2月,政府关于在夸胡和阿散蒂之间建一条防护地带以防止肿芽病蔓延的决定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很多地区都有反对政府的报告。1942年,殖民总督仍在抱怨,对肿芽病的控制不能得到可可农的支持与合作。从1945年8月起,政府专门雇佣劳工来砍病树,但需经可可农的同意。1946年底,殖民政府通过了《可可肿芽病法令》(148号)。规定每一个可可农场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必须将其农场里受感染的可可树砍除。1947年,农业部开始采取更直接更有效的行动:由政府雇佣的劳工强行砍掉病树。

1948年“阿克拉事件”发生后,政府停止了强行砍树措施。在沃森委员会的建议下,联合国派出了三位专家到黄金海岸研究肿芽病及其控制措施。经过六个星期的调查,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肿芽病由一种非常危险、传染性极高的病毒引起,它直接危害黄金海岸可可业的存在;砍除病树是唯一有效的控制办法,应该尽快恢复砍倒病树的措施,并要加大范围。结果,尽管遭到农民的强烈反抗,强行砍树的措施于1949年恢复。1951年5月,在为了调查砍树的组织和方法组成的科尔萨委员会提出报告以后,政府再次中止了强行砍树措施。

二

控制肿芽病的措施分为三个阶段:普查、初处理和再处理。普查是对所有地区进行调查,并对每一棵可可树进行检查。初处理是砍掉所有的病树。再处理是指对受感染树周围的可可树进行检查,并砍掉新受感染的病树。在防治肿芽病的各个阶段,可可农都进行了反抗。概括地说,从1941年初正式恢复砍树措施以来,爆发了四次可可农的反抗浪潮。

第一次浪潮 1941年2月,政府决定在夸胡和阿散蒂之间建一条防护地带,以防止肿芽病的蔓延。防护地带的开辟需要在夸胡境内铲除大约250英亩的健康可可树。这一决定在夸胡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这意味着夸胡的可可农将为阿散蒂地区的可可业作出牺牲。

奥波的农民向农业部提交了一封抗议信。尽管夸胡地区最高酋长和东部省专员对政府的意图一再解释,但农民们根本不相信殖民政府的计划。他们认为,政府企图摧毁可可业,这只能在“防止树病的幌子下进行”。殖民政府决定给夸胡人28天的限期。如果他们继续抗拒政府的命令,“政府将根据法律的权力开展工作”。最后,东部省专员只好威胁用警察来执行砍树任务。在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有些农民甚至担心,在砍树的过程中,一旦政府的农业官员走进他们的可可农场,他们的农场即会被政府没收。

第二次浪潮 二战刚结束,殖民政府又发起了一场砍树运动。《沃森报告》曾指出,从1945年8月即政府开始雇佣劳工在征得农民同意后砍病树,到1947年12月之间,没有发生过“有形的反抗”。事实并非如此。1945年10月,肿芽病控制运动在阿散蒂开始。到1946年6月,共砍除10万棵病树。由于遇到了农民的强烈反抗,政府不得不停止行动。后来,在阿散蒂

(英国殖民部档案) CO 96/741. A. W. Hodson to W. G. A. Omsby-Gore, 4 December 1937.

Legislative Council Debates, Session 1942, No. 1, p. 4

The Swollen Shoot Disease of Cocoa Order 1946 No. 148

Colonial Office: Annual Report on the Gold Coast for 1948 (London: HM SO, 1950). Appendix IIA.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to the swollen shoot disease of cocoa in the Gold Coast p. 178

Legislative Council Debates, Session 1941, No. 1, p. 55

(加纳政府行政档案) ADM 11/1799 Provincial Council (Eastern Province). Minutes of 35th session, p. 29

Watson Report, para 264

邦联议会的支持下,砍树才得以恢复。根据农业部专门负责阿散蒂地区防治肿芽病的视察官员西斯罗普掌握的情况,“农民仍不愿意他们的树被砍掉,砍树进度要比期望的慢”。在殖民政府档案中,还可以发现一些农民不满的例证。

在1948年2~3月的阿克拉事件中,农民们十分积极地参与了反抗活动。根据丹夸的描述,阿基姆-阿布阿夸、阿基姆-科托库、阿夸平和夸胡的农民举行了几次会议讨论影响可可农的一些问题,包括肿芽病。他回忆在2月26日那天他参观了塔福的研究基地,碰到了一些农民。他们态度敌对,语调强硬,质问丹夸为什么要签字同意砍树。”

第三次浪潮 这次反抗浪潮始于1949年底,当时殖民政府开始实施“经同意强制砍树”的措施。这一政策遭到了可可农的强烈反抗。很多农民认为,这一措施实际上是要消灭所有的可可树,不管是病树还是健康树。农民们最不满的是砍掉他们挂满果实的树。1950年7月的《可可病控制月度报告》指出:“这种反抗会随着主要作物成熟而在数量上和程度上增加”。两个月后,报告提到,农民们“继续反抗砍掉挂满正在成熟的果实的病树”,并要求防治措施推迟到所有的果实收获以后。在一些地区,农民的反抗十分强烈,殖民政府不得不将警察调来维持秩序。

第四次浪潮 1951年初,政府决定任命科尔萨委员会调查肿芽病防治工作特别是强制砍树的组织和办法。1951年4月4日,政府事务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宣布:“我们关心的是砍树的方法和组织,正是为了调查这一方法和组织问题,政府同意暂时中止强制砍树。然而,政府的政策被谣言大大地曲解了。在苏胡姆等一些地方,可可农和砍树人员之间发生了直接冲突。有的政府人员被农民威胁甚至遭到攻击。在一些地区,负责肿芽病防治工作的调查人员由于“村民们好斗的对立”而不得不撤走。很多农民都担心,所谓的调查只是大面积摧毁可可树的前奏曲。最严重的冲突出现在广播后的数日。在东部省,政府农业部的人员遭到“一群流氓的骚扰和攻击,他们声称政府已命令停止一切(砍树)措施”。根据1951年4月的月度报告,在很多地方发生了激烈对抗。同年5月30日,政府决定停止强制砍树。

农民反抗的形式可谓多种多样。他们不许农业部官员进入其可可农场,或拒绝告诉调查人员其农场的地界。一种常见的反抗形式是拒绝为普查人员提供服务。1950年,政府官员在科福里杜亚和邦苏进行肿芽病防治工作,农民除了进行威胁之外,还拒绝提供食宿。间接的反抗形式还包括在政府人员工作时“尽量使他们的生活不舒服”。谣言也成为反抗的一种形式。

有的反抗是以破坏活动的方式来进行的。从1950年底开始,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作为普查标识的短桩和地界标志或被移走,或被毁坏。12月,西部省一个地区发现了首例这种行为。随后很快扩及其他地区。1951年2月,东部省也发现了类似情况。初始,这种有意识的破坏行为并未引起注意,政府方面无人认为这是“严重的反抗行为”,而只视为“孩童般的举动”。

Minutes of the 13th Session, Appendix III Mr. Hyslop's Address p. 35

J. B. Danquah, *Journey to Independence and After (Danquah's Letters)* (Accra: Watterville Publishing House, 1970), compiled by H. K. Akyeampong, pp. 56-57.

(加纳政府行政档案)ADM 36/1/114 File No. 19. Monthly Report, September 1950

(加纳政府行政档案)ADM 1/2/316 Statement by Leader of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the Minister of Health and Labour in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the cutting-out of diseased cocoa trees

(加纳政府行政档案)ADM 36/1/114 File No. 19. Monthly Progress Report May 1951.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Monthly News-letter*, January 1950; April 1951.

(加纳政府行政档案)ADM 36/1/114 File No. 19. Swollen shoot Quarterly Progress Report of Oda Division, December 1950;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Monthly News-letter*, January 1951.

然而,当这一反抗形式全面铺开时,月度报告不断出现惊呼和抱怨。在一些地区,破坏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这意味着必须花费很多时间来重新补上”,因为这些普查桩和界标对普查工作十分重要。

武力对抗也时有发生。早在1950年以前就有武装反抗发生。1950年10月,在夸胡地区发生了冲突事件,政府只好派警察维持秩序。同月,英属多哥农民与政府派来砍树的劳工发生武装冲突,一名劳工被枪弹击中。11月,在西部省的一个地区,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骚乱”。据称,“在所有的区均有反对派”。最后,在警察干预下,砍树工作才得以继续进行。12月,局势变得更为严重。博姆塔帕的农民强烈反抗砍树,警察逮捕了好几个人才使骚动平息下来。1951年4月以后,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在可可地里遭到攻击。如东部省的几名砍树者被严重打伤,一名劳工的手被打断,另一名被打掉了几颗牙。

尽管不同阶层对砍树的态度各有不同,但由于这一措施影响面广,因而极不得人心,很少有人出来公开对政府的政策表示支持。一院制议会的非官方代表(多为非洲人)与受过教育者深知肿芽病的危害,但他们知道众怒难犯,不愿与广大的可可农唱反调。1948年的阿克拉事件以后,阿散蒂国王特意在广播里澄清了自己的立场:“我听到并亲眼看到了这个国家目前因砍除病可可树而引发的骚乱。我很高兴利用这一机会阐明我的立场。正在传播的谣言说,我和我的酋长们在命令砍树的文件上签了字。我向你们保证:这一流言不真实。这个国家没有人不从可可上得利。那么怎么会说从可可上得利的人希望可可树被砍除从而毁掉整个可可业?”

三

《沃森报告》认为,反对砍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治煽动的。这一结论虽然未能反映出事件的全貌和本质,却间接表明了加纳农民反抗斗争与民族主义的某种联系。尽管反对砍树从根本上说是经济上不满的表现,但这种不满情绪却被民族主义者充分地加以调动,并引向自治独立运动。正如人民大会党领袖、加纳第一任总统恩克鲁玛所指出的:“必须公道地说,在我们倡导的自治运动中,我们并不反对任何自发的不满情绪,如果这样做能促进实现我们的政治目的的话。”

虽然在官方档案里难以直接找到民族主义与农民反抗斗争之间相互联系的证据,然而,从殖民地报纸、殖民官员的通信以及肿芽病月度报告中,我们可以找出这些联系的间接证据。这些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一些民族主义领袖通过新闻媒介和其他途径或为可可农的困境鸣不平,或为反对砍树出谋划策。这从大氛围上促进了可可农的反抗运动。1947年7月25日,民族主义领袖威廉·奥弗里·阿塔在《黄金海岸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国家的农业》的文章。他分析了可可生产的现状和反对砍树运动的缘由,强烈批评了政府控制肿芽病的

(加纳政府行政档案)ADM 36/1/114 File No. 19. Swollen shoot (Eastern Province). Cocoa Disease Control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ess Report of April 1951 Dated 6 June 1951; (加纳政府行政档案)ADM 36/1/114 File No. 19. Swollen shoot. Monthly Progress Report of Oda District, January 1952

(英国殖民部档案)CO 96/830/31709/1950. Shots Gold Coast, Accra, 28 October 1950, Reuter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Monthly News-letter, December 1950; January 1951.

(加纳政府行政档案)ADM 36/1/114 File No. 19. Swollen shoot (Eastern Province). “Cocoa Disease Control and Rehabilitation Monthly Progress Report, April 1951” dated 6 June 1951.

The Gold Coast Observer, 2 April 1948, p. 585.

Watson Report, para 265.

《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80页。

措施。他将农民对砍树的抵触情绪与其生活水平联系起来。他提出赔偿金应考虑生活必需品的涨价和农作物收购价的降低等因素。由此可见,这位民族主义者是从可可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殖民政府则是从纯经济作物的角度来防治肿芽病。他还将可可业与加纳的未来连在一起。“未来怎么样?我这里并不是仅仅关心可可树的未来,我甚至更关心黄金海岸农业和黄金海岸自身的未来”。他后来当选为阿基姆-阿布阿夸农会的负责人之一。

著名的加纳民族知识分子小托马斯·哈顿·米尔斯和艾尔夫·奥坎塞等人作为律师或商业顾问直接参与了农民运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统一大会党的创始人、民族主义领袖丹夸。在反对砍树的运动中,他以律师的身份为农民提供咨询意见,出谋划策。

其次,种种史料表明,民族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了反对砍树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将农民经济上的不满引向政治上的要求。1948年2月13日,《黄金海岸观察家》同一版上出现了两篇评论员文章。一篇题为《肿芽病的更多麻烦》,另一篇为《黄金海岸的民族主义》。这种选题和排版绝非偶然。它既暗示了殖民政府的无能,也表达了人民对自由的向往。其中一篇阐述了可可农的困境,他们“有因为提前预支所欠的款项;有他自己及其家人所损失的收入。更糟糕的是,他面临一个未知期限的破产。他埋怨政府,他埋怨农业部官员,他埋怨可可市场委员会……他成为一个不满的潜在根源”。这一“不满的潜在根源”果然在半个月后爆发了。

1949年6月的控制肿芽病月度报告指出:“不幸的是,唯一准备领导的人正是那些反对防治的人。他们反对砍树并非出于对肿芽病的性质和传播的科学认识,而明显是为了在每一个可能的方面使政府难堪”。1950年11月,政府发现一些讨论反对砍树的会议是由“具有政治头脑的人而非真正的农民”组织召开的。殖民政府难以掩饰其担忧的心情,“很不幸,我们得到所有受过教育者的全力支持。一些人明显是为了政治目的,继续散布关于控制肿芽病运动的目的和手段的一些谣言。这些人大部分对可可种植业没有直接兴趣”。1951年7月,殖民总督在写给殖民大臣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担心,“自从5月30日停止强制性砍树以来,仍然存在着普遍的反抗情绪,这种情况在东部省尤其明显。那里发生了多起由不是农民的人组织的反抗行动”。为了更好地对可可农进行控制肿芽病的宣传,政府决定在一些村子里组织这类宣传会议。政府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会议竟然变成了民族主义者进行宣传鼓动的极好机会。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会议上占了主要地位。一份政府年度报告披露,这些大规模的会议用处很小,因为这些会议“往往吸引了一些对控制措施毫无兴趣而一味破坏政府有关政策的人”。

毫无疑问,上述政府文件中提到的“唯一准备领导的人”、“受过教育者”、“不是农民的人”或“有政治头脑的人”指的正是二战后非常活跃的加纳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可可农积极参与了阿克拉事件以后,加纳的民族主义者日益认识到农民的力量,从而加强了在他们中间的宣传组织工作。他们力图利用各种机会宣传组织群众,将农民经济上的不满转化为对殖民政府的怨恨,并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这是农村社会反抗与民族主义的第二种关联。

民族主义与反砍树运动的第三种联系反映在一些政党组织直接参与了反砍树运动。1947

William Ofori Atta, "Our Country's Agriculture," *The Gold Coast Observer*, 25 July 1947, p. 146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Monthly News-letter*, June 1949.

(加纳政府行政档案)ADM 36/1/114 File No. 19. Monthly Report November 1950

(加纳政府行政档案)ADM 1/2/316 Saving No. 94 Governor to Secretary of State 6 July 1951; (加纳政府行政档案)ADM 36/1/114 Swollen shoot Monthly Progress Report of Oda District, June 1951.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Monthly News-letter*, June 1949.

年8月4日,一批民族知识分子(包括丹夸和威廉·奥弗里·阿塔)建立了加纳的第一个政党——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他们力图在农民中间寻求支持者,而反对砍树的农民也正需要同盟军。1948年初,位于东部省的阿基姆-阿布阿夸农民协会成立,而这一地区被新闻界称为“抵抗砍树运动的核心”。阿基姆-阿布阿夸农会的决议指出:“目前政府在肿芽病防治运动中砍掉可可树的政策是为了摧毁可可业,同时使这个国家的整个经济以及农民及其家庭破产”。会议一致决定:第一,阿基姆-阿布阿夸的农民反对政府的砍树措施;第二,为了可可业和农民的利益,政府派出进行初处理和再处理的砍树人员必须撤出。其他地区农民组织也起着同样的作用。

1948年阿克拉事件以后,恩克鲁玛因为主张更激烈的策略而与统一大会党发生矛盾,并于1949年6月成立人民大会党。人民大会党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明确宣布要照顾可可农的利益,表示要特别注意肿芽病,并由农民控制可可工业委员会基金。对砍树措施反抗最激烈的则是加纳农民大会。1949年12月13日,加纳农民大会宣告成立。农民领袖阿西·尼科伊与约翰·阿尤毅然决定与保守的统一大会党决裂,加入了人民大会党。这样,农民大会成了人民大会党的一个政治派别。1950年10月,加纳农民大会举行会议。大会向殖民秘书发出电文,指出:农民已不能再在“经济奴隶制”的枷锁下生活了,同时对可可复兴部的存在价值表示怀疑。确实,根据后来的科尔萨报告,可可复兴部成立后,住房建筑共花费12万英镑,修路费达1.78万英镑,拖拉机及其他修路机械共花费3.4万英镑。农民大会的电文指出:“本会议坚信,可可复兴部是一种浪费,其服务丝毫不能抵偿其花费”;电文还揭露,由于负责官员“缺乏或很少经过科学训练,很多挂满果实的健康可可树被砍除”。

1950年11月,农民大会又发给殖民秘书一份电报,要求立即停止由未经训练的欧洲人领导的可可复兴部派出劳工的砍树方式。除此之外,农民大会还提出了其他更具政治性的问题,如可可市场委员会与可可农的关系以及可可农的政治权利的问题,他们要求政府考虑可可农在一院制议会的代表权问题。这种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反映了加纳农民政治觉悟的提高。两个月以后,加纳农民大会的10个支部分别给英国国务大臣去电,对殖民地农业部动用武力砍树的行为表示抗议,并指出这种行为可能挑起“爱好和平的农民发动对一个托管政府没有好处的骚乱”。其中一个支部的电报措辞强烈:“尽管面对强烈的反抗,摧毁可可园的行动仍在继续,辅之以逮捕和起诉的威胁……国家将被引入混乱和无秩序状态,因为农民已不能忍受这种在保持法律和秩序的幌子下进行的挑衅”。不言而喻,加纳的农民不仅积极投身于反抗活动,而且通过自己的组织开始争取应有的政治权利。

有些民族主义者则直接担任农民组织的领导人,如加纳农民大会书记阿西·尼科伊即是人民大会党东部区的主席。他的活动受到恩克鲁玛和其他民族主义领袖的支持。这种情形理

“Resolution II The Akyem Abakwa Farmers Union, 28 January, 1948 Minute of the 13th Session of the Ashanti Confederacy Council, Appendix IV, p. 38

(英国殖民部档案)CO 96/830/31709/1950 Ghana Farmers' Congress to James Griffiths (Colonial Secretary), 27 October 1950

(英国殖民部档案)CO 96/830/31709/1950 Ghana Farmers' Congress, 1950 Cable to Colonial Secretary, 28 November 1950

(英国殖民部档案)CO 96/830/31709/1951 Cable from Ghana Farmers' Congress 11 January 1951. Encl in Fenner Brockway (M. P.) to Secretary of State, 15 January 1951. Cables from Ghana Farmers' Congress to Secretary of State, from 13 January to 30 January 1951.

(英国殖民部档案)CO 96/830/31709/1951 Cable No. 8 18 January 1951.

所当然地引起了殖民官员的警惕。黄金海岸最后一任总督阿登-克拉克爵士对此表示担心：“人民大会党将利用任何地方的不满情绪以尽力争取农村地区的拥护者。因此，很可能一旦加纳农民大会看上去开始具有影响力，人民大会党将会使其成为竞选运动中有力的辅助工具。”

殖民总督的担心变成了现实。1951年，当人民大会党领袖恩克鲁玛尚被关在监狱时，他领导的人民大会党竟然赢得了全国大选。结果，殖民政府只好释放恩克鲁玛，并授权他组织新政府。恩克鲁玛的人民大会党终于领导加纳人民于1957年取得了独立。

* * * *

一般来说，农民的社会反抗至少须具备两个条件：权力机构的权威产生危机与农民自身的经济利益受到极大伤害。在殖民统治时期（推而广之，在任何时期），不管是谁，只要他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农民就要进行反抗；尽管有时这种伤害是为了殖民地长期的经济利益。无庸讳言，加纳农民反对砍树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但是，当这一反抗与民族独立运动相结合时，它就成为反对殖民主义的一种力量。民族主义者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丹夸在接受沃森委员会的调查时即指出：政府为铲除肿芽病而定的方案在科学上是正确的，但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

概言之，农民对殖民政府的意图总是持怀疑态度，这为殖民统治的实质所决定。这种怀疑在其经济利益受到侵害时则变为敌对情绪，最后演变成民众反抗。砍树持续了15年，反抗也持续了15年。尽管农民的利益与民族主义者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农民反抗的目的与民族主义运动的目的也不尽相同，然而，农民的怀疑-敌对-反抗的行动与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之间却存在着一种天然联系。这种联系将前者转变为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普通的非洲农民转变为政治积极分子。这样，农村反抗运动与民族主义等其他因素一起，将殖民主义推到了危机的边缘，从而加速了民族独立运动的进程。

（本文作者李安山系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副教授）

（英国殖民部档案）CO 96/830/31709/1950 No. 989 (Confidential). Inward Telegram. Governor to Secretary of State, 14 November 1950

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只要农民的利益遭到伤害，农民就会奋起反抗。在南非，农民竭尽全力反对政府为了防止牲畜受病菌感染而强制进行的牲畜浸泡；在马拉维，农民坚决反对殖民政府进行的防止土地受到侵蚀的措施。这可以看作政治反对科学的另外两个事例。参见W. Beinart & C. Bundy, *Hidden Struggle in Rural South Africa*, pp. 191-221; C. Mandala, *Works and Control in a Peasant Economy: A history of the lower Tchiri Valley in Malawi, 1959-1960* (Wisconsin: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19-237.